

孔子研究

钟肇鹏著

孔子研究

钟肇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子研究

钟肇鹏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45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统一书号: 2190·059 定价: 0.64元

《孔子研究》序

任继愈

在二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孔子被尊为圣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即使有个别特立独行之士，敢于对孔子的言行提出某些怀疑，也只能在细微末节方面有所评论，还没有人敢从根本上对孔子的崇高地位进行指摘。直到“五四”时期，孔子才从圣人的宝座上被拉下来，退居先秦诸子之列。

孔子在中国的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他生前名气很大，但很不得意，栖栖遑遑，没有机会推行他的政治理想，赍志以殁。他从事教育多年，培养了许多有学问有政治才干的学生，他的学生们从各个方面发挥孔子的思想。时代在变，孔门弟子们参加了当时各国不同的政治集团，其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有的保守、有的激进，古人说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虽是慨叹，确是事实。

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对孔子的学说给以神学解释，孔子被装扮成半人半神的偶像。这是孔子学说的第一次被改造。汉以后儒家相传的经典被历代统治者用作教材，这就更加扩大了孔子的影响。

南宋朱熹对孔子及儒家学说进行了第二次大改造，孔子的言论及著作（包括孔门传授的经典）被宋儒给以新的注解，把佛教、道教的宗教修养方法渗透到儒家的学说中去，从此

形成系统的新儒学（也称为儒教）。直到“五四”运动，孔子才从神变成人。

应当看到，“五四”以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这个阶级的力量软弱（政治上、经济上），在思想领域里也不坚强，打了几个回合，就与封建主义妥协了。直到“五四”运动发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五四”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是很不彻底的。象当年指名道姓批判孔子的章太炎，后来也成了尊孔读经的积极分子。至于那些维护封建主义的人，总要吹捧孔子，以至把孔子抬到吓人的高度。如果与封建主义划不清界线，就无法正确评价孔子；不能正确评价孔子，与孔子相关联的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也不能如实地作出科学的论断。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见解，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也影响到对孔子的评价。建国三十年来，政治运动频繁，有时把学术上可以讨论的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而一些政治运动又往往借学术批判的名义为它开路。象孔子这样的人物，多次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十年动乱时期产生了所谓“影射史学”、“儒法斗争”这样的怪胎，对学术界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对孔子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博学的学者，研究者可以根据材料进行分析、论证，从而得出各自相应的结论。学术上不必强求一律，事实上也不可能一律，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百家争鸣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唯一途径。

钟肇鹏同志治中国哲学史多年，治学态度谨严，不虚夸，务实。他不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随波逐流。钟肇鹏同志的见解代表他一家之言，人们可以赞成，可以不赞成，只要尊重事实，多方探讨，总会推动历史科学的前进的。这里收集的论文，发表时间相去约二十年，中间经历了多次运动，论文的作者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尊重历史，从具体材料出发，没有趋时髦或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这种态度是可取的，可贵的。学一种新技术，可办一个速成训练班，可以立竿见影，但是做学问没有这样容易，好比登万仞山，好比行万里路，走了一段，回头看看，才发现前进了。二十年来，钟肇鹏同志不断进步，学问也逐渐成长。这些论文正是记载着他对孔子研究的足迹。

全国解放后，中国哲学史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有了明显的进步。在老一辈学者的关怀下，成长起来一批有为的中青年学者，肇鹏同志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之一。他除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外，近年又转向道教思想的研究。他有较好的文字训诂的基本训练，又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我希望他在新的科学领域里作出新成绩。

目 录

《孔子研究》序·····	任继愈 (1)
--------------	-----------

如何剖析孔子思想

——写在本书前面·····	(1)
孔子的基本思想·····	(13)
略论孔子思想的阶级性·····	(26)
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	(42)
孔子的哲学思想·····	(57)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文献整理工作·····	(81)
孔子的伦理教育思想·····	(102)
孔子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118)
孔子系年·····	(150)

附 录

论“经”和“史”·····	(171)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185)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	(194)
后 记·····	(203)

如何剖析孔子思想

——写在本书前面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就时间说，自战国以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孔子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从空间上说，孔子的影响及于国外，是一个公认的对世界文化思想有影响的人物。

对孔子和孔子思想的评价，从历史上看就是毁誉并陈。远在春秋末年，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奉为“圣者”、“天纵之圣”；而诋毁他的人就说他是“累累如丧家之狗”。自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以后历代封建帝王竞相推崇，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揭开了现代批孔的序幕。

“五四”时期的批孔，对于涤荡封建文化的污泥浊水是有巨大的成绩的，但是，当时的学者尚未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武器，不免流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坏，就绝对坏，好，就绝对好，对历史和现实都难于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论断。因之，对中国长期封建文化的清理和封建意识的批判，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历史往往会嘲弄人的，没有想到五十年之后，“四人帮”又打起假批孔的幌子，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而暗中却大肆兜售封建主义的黑货。打倒“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

以来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新得到贯彻，对孔子和孔子思想再评价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现在我们有条件做到各抒所见，畅所欲言，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做出科学的评价。但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一个人物谈何容易，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这说明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是一项要求积年累月、潜心钻研的艰苦的工作。下面就孔子研究谈几点看法。

（一）

哲学史是反映哲学发展的历史。黑格尔曾经把哲学史的发展比做圆圈。列宁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②并进一步把它阐述为“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③在一串圆圈里面，每一圆圈都是发展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说明作为哲学发展的历史有其必然的进程，是有规律性的。黑格尔讲：“哲学的历史不是一些偶然幻想的盲目聚集，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进程。……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必然出现，因而一种哲学必然以先行的哲学为前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

③ 同上书，第411页。

提”^①。哲学史中一系列哲学体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乱七八糟纷然杂陈的，也不是只按它们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就是哲学史。一个哲学体系的出现应该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去把握。这就得考查它的先行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后继的哲学思想又是什么，发现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看出某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这种联系也不是简单的按时间顺序的外部罗列，而是辩证的符合逻辑的发展。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既不无限地膨胀、夸大、神化某一哲学体系，也不故意压抑、贬低某种哲学思想，而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哲学发展历史的真实状况。黑格尔曾经说过：“对于古代的哲学必须尊重它（发生）的必然性，尊重它是这个神圣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但也只是一个环节”^②。黑格尔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却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些关于用辩证的方法研究哲学思想的论述是值得重视和汲取的。

在探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我们首先回顾了殷周的天道观，对它进行了检讨分析；然后再看孔子的天道观，他基本上继承了殷周的传统观点，但又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传统的东西代表孔子思想中的保守的方面，而其特点方面才反映出时代精神。由殷周天道观，经子产、孔子到墨翟是个小圆圈，由孔子经思、孟至荀卿是个小圆圈，由老、庄经《心术》、《白心》^③至荀子又是个小圆圈。从殷周天道观经孔子、墨、孟、老、庄、稷下到荀卿，构成先秦天道观发展的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先秦天道观发展的链条。从先秦天道观发展的整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378页。

② 同上书，第374页。

③ 《管子》中的《心术》、《白心》，据郭沫若同志考证，系宋尹学派的著作。今从之。

个链条中可以看出孔子天道观在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可以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

从六十年代的孔子讨论，经“文化革命”中的“批孔”，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孔子及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也是一个“小圆圈”，在批判和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仁”与“礼”在当时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及孔子的“礼”与周礼的异同问题。二、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及季氏“以田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三、孔子与子产的比较及孔门后学对孔子的评价问题。四、“君子”、“小人”，“人”、“民”等概念的具体内容。五、对基本历史线索的看法等等。对这些问题本书中都涉及到，有的做了一些比较的研究分析。当然这些研究还只是很初步的。结论是否能够成立，是否符合科学，这就有待于大家的批评指正，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有待于历史的检验了。

(二)

就史料来说，在先秦诸子中，关于孔子的材料可以算是最多的，但正因为材料多就更不能不有所抉择。《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结集的，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论语》中不仅记载了孔子生平重要的言行，甚至连他的饮食起居、生活细节也有所记述。研究孔子思想就要求我们掌握其思想体系，作全面地剖析。如果不从他的基本思想出发，而“各取所需”，抓着一两句话加以引伸发挥，那就什么结论也是可能得出的。列宁说：“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

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这说明详细占有材料的重要，不仅要详细占有材料，并且对这些材料还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和鉴别。关于孔子的材料很多，《论语》和《左传》都是比较可信的，但也并不是条条都可靠，绝对没有问题。即以晋铸刑鼎为例，许多同志都认为铸刑鼎是当时新兴封建阶级进步的政治措施，孔子反对铸刑鼎，是其立场反动的有力证据。其实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过早一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说：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按“夷之蒐”即“蒐于夷”，《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说：

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赵盾的父亲赵衰谥成季，阳处父曾经为赵衰的大夫，所以说：“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据旧注及杜预注，这里的宣子指的就是赵盾，^①而不是范宣子。把文公六年与昭公二十九年两文对校，可见后者在记载上是有问题的。第一，因为赵盾与范匄两人都谥宣，把赵宣子误为范宣子，其实制刑书与范匄并无关系。第二，刑书之作在“改蒐于董”之后，而上面引仲尼的话说成是“夷之蒐”，也是不确切的。这种张冠李戴，史实不确的记述，究竟是否是仲尼的话，就很值得怀疑。《左传》是一部比较可信的史书，但如这里的“仲尼曰”以及许多“君子曰”，好些是后人所加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有问题。先秦诸子以及汉代人的著作中记述孔子言行的也不少，这些材料好些是传闻、附会、甚至是编造的，当然也并不是每条都不可信。本书在《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一篇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了可靠的材料，并不等于已经掌握了它，只有能够正确理解和应用这些材料来进行研究，才算真正掌握。这里不仅涉及到文字训诂，古汉语的语法词例，还有古代哲学家用的专门术语、词汇等，不理解这些就会“郢书燕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譬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②）有些人就把“和”解释为调和，又从现在对“调和”一词的理解证明孔子是搞折衷主义的。殊不知“和”与“同”是春秋以来专门的哲学术语，“和”指矛盾的对立统一，“同”是等同，指无差别的同一。孔子思想中确有折衷主义的方面，但根据这句话就戴上折衷主义的帽子则属于望文生训，是站不住脚的。又如孔子说的“仁

① 杜预注：“宣，赵盾谥。”《太平御览》卷622引“旧注：宣子，赵盾”。

② 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

者爱人”，究竟包不包括“民”在内，这就涉及到“人”和“民”在春秋时代是否是对立的阶级，这种问题不仅是训诂文字上的问题，而且直接牵涉到对孔子的阶级分析和思想评价。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把先秦古籍中关于“人”、“民”两字的含义和演变作系统的调查，特别是从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的含义和用法上做比较研究，才能做出较为可信的论断，恐怕很难根据《论语》一书就得出结论来。要是认为《论语》中讲的“人”就是指统治阶级，“民”指被统治阶级（即奴隶），那么“厩焚，子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试问这“人”究为何指？把养马的人也说成是奴隶主怕是困难的吧，然而竟有人把这里的“人”说成是“养马的官”。如此强词夺理，也就难与辩论了。同样，孔子说管仲的功劳很大，“民到于今受其赐。”（《宪问》）又说“使民如承大祭。”（《颜渊》）那么，这只是说管仲使奴隶们受到好处，而对奴隶主阶级就没有贡献吗？役使奴隶还要象亲临大祭祀一样敬重吗？这些都是很难说通的。本书对这些问题也做了一些考察和分析。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与“民”的用法有时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是普遍的情况，有人认为“人”与“民”是对立的阶级，此种看法难于成立，因之，本书不采取这一说法。

（三）

由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也增加了评价孔子的困难。关于古代史的分期，现在还没有一致意见，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也难于取得一致的看法，这种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只能让它长期争鸣下去。

在关于孔子思想的阶级性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也有人认为孔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认为孔子代表奴隶主的利益，在主张西周封建说的同志看来，就很难成立，因为要是西周已经是封建领主统治，那么，生在五百多年以后的孔子还想复辟奴隶主的统治是很难想象的。而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同志，认为汉代都还是奴隶社会，那么要把七八百年前的古人说成已具有封建思想，这显然是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本书里基本上采用郭老的观点，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但是，在承认春秋以前是奴隶制社会这一共同前提的同志中，看法上也有分歧。许多同志认为孔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的思想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本书则认为孔子代表封建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这说明大口径一致，小口径还不一致。这牵涉到对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看法不同，也牵涉到对季孙氏用田赋及晋铸刑鼎的性质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总之，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对周代的历史实际和春秋时代各国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如果不把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一弄清楚，要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是很困难的。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研究孔子，对孔子思想的分析批判与写一部孔学（儒学）发展史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局限于对孔子思想及孔子本人的评价问题，后者则包括儒学的产生、兴起、发展、变化、对历代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其研究范围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都大不一样。一般说，一个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在其死后往往会分成各种不同的流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就是证

明。到了后世，由于时代和需要的不同，借用他们的语言，打着他们的旗号，利用他们的名声和影响，抬出死人来为活人服务这本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但往往也可能把历史的真象弄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打着同样的旗号而彼此对立，视若仇敌。这种事例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在现代也不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这里要紧的是在善于区分：一、本来的含义和在当时的作用，二、后人的引申和发展，三、对后世的影响，四、后世的歪曲和利用。对于这些，切忌笼统和含混。儒学在汉武帝以后定于一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哲学思想往往以解说经书，依傍经传的儒学形式出现。汉代的今文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一直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庸注》、《礼运注》、《孟子微》等书都是这样。孔子被历代改装塑造，他的形象有时神化，有时鬼化；有的美化，有的丑化。这里面由于历史情况的复杂，我们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做“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②因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儒学后来的发展、变化，应该从后世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而不能不加区别一古脑儿记在孔子的帐上。以“五四”前后的尊孔、批孔为例：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组织筹安会，提倡尊孔读经，并且把尊孔写到宪法里面去，康有为要保皇复辟，提倡以孔教为国教，所以“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有的人就认为中国之所以

① 《马克思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②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不进步，不文明，其根源就在孔学，而有的人则认为当今世风日下，道德风俗的败坏，正由于孔教不行。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没有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时易白沙讲过几句比较清醒的话，他说：

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诿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佑，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①。

李大钊对当时批孔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他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学》一文中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② 简单地说，不打倒孔子这具偶像的权威就不能够解放思想。当时如陈独秀、吴虞、钱玄同等等都有许多激烈的批孔言论，而其主要目的则在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复辟倒退。如果不加分析，把后人对孔学的附会、歪曲通通记在孔子的头上，那么什么问题也讲不清楚。至于后世对孔子的利用，如像历代帝王和反动统治者对孔子的加官进爵以及一切的尊孔活动，只不过是借孔子这尊偶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其目的不在尊孔而在尊重他们的私利。正如“四人帮”的假批孔，其目的并不在批判孔子，而是借

① 《孔子评议上》，1916年2月《青年杂志》第1卷，6号。

② 《李大钊全集》，第30页。